



10 楼社教部某某某中招了。5 楼办公室某某关进去了。11 楼食堂有人被隔离了……

1988 年 1 月中旬。一个个不幸的消息，接连传到我上班的永安大楼 9 楼经济部；让人感到甲肝这个病魔就在身边徘徊。

办公室的南窗看得到浙江路九江路转弯角的旅社。在上海旅馆业，大的叫“饭店”，中小型的称“旅社”；这家旅社已征用为隔离病房，不时有夹着被头铺盖的人走进去。后来才知道，经全社会动员、各行各业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床位 1254 个、肝炎病床 11.8 万余张和家庭病床 2.9 万余张。

1987 年 6 月，上海电视台二台成立。我负责《小菜场·商情·气象》专栏，每日播出节目 15 分钟，忙

天花，是由病毒引起对人类最常见、致死人数最多的传染病之一，天花在旧大陆，如欧洲、印度，曾导致超数亿人口的死亡。15 世纪末，由于欧洲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将天花传入新大陆，这里原来居住着 2000 万—3000 万原住民，100 年后原住民人口剩下不到 100 万人，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也同时被疾病毁灭了。

唐蕃古道是连接内地和青藏高原的交通要道，这条道路不仅是贸易的通道、和亲的通道、文化的通道，同时也是疾病传播的通道。在明清之际内地天花疫流行时，青藏高原也深受其害。如今，在拉萨大昭寺门口，竖立在寺前的“劝人恤出痘碑”，承载着天花曾经肆虐青藏高原的过往。

天花进入青藏高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1779 年，乾隆皇帝 70 岁生日。西藏六世班禅大师计划亲自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参加承德避暑山庄这一庆祝活动。但是，此时正值北京天花肆虐，无数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对天花略知一二的扎什伦布寺官员们以旅途遥远极易感染天花为由，对班禅大师进行劝阻，但班禅还是决意前往。

班禅大师历时一年多的舟车劳顿终于到达热河，乾隆皇帝也甚为感动，热河行宫上下下都在为此忙碌着。深感责任重大的班禅不顾酷暑天气，在热河行宫连番举行须弥福寿庙开光典礼—祈愿法会等活动，又前往北京进行一系列传法讲经授戒、为国为教祈祷、檀香释迎寺开光活动。十月下旬，班禅大师的身体终于被天花击倒了，并在十二月二日圆寂。翌日，乾隆皇帝亲率群臣面谒大师遗容，非常悲伤，自责：班禅“笃诚而来，并未能平安回去，朕心实为悼惜”。

乾隆的哀悼，也有着清朝皇室深受天花肆虐的不堪回首的悲情。顺治皇帝就因病染天花而死，康熙之所以能顺利登上帝位，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幼时曾经患过天花，或许之后再也不会惧怕天花了。

乾隆皇帝决定在青藏高原普及天花知识和应对措施。但是，这一时期正是世界攻克天花的关键时期，还没有成熟的对策。在这之前，天花造成了十八世纪欧洲几千万人的死亡。1562 年英格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患上了严重的天花，虽然康复了但满脸的麻子使她选择了独身，终身未嫁；俄国沙皇彼得三世在 1744 年罹患天花，成为《大英百科全书》所讥讽的：“自然赋予他刻薄，天花赋予他丑陋”。由此可看，以皇室条件之优渥尚且如此，那么民间种痘凶险不待言。

得没空去父母家。没我这毛蚶爱好者，姆妈也不买了；没想就此逃过一劫。甲肝凶猛，但电视不能停，而且还要做一档春节特别节目——《最佳年夜饭》。

我们早在《每周广播电视》报发布上海首次“最

一餐饭里的智慧和信念

袁念琪

佳年夜饭征集”，入围者可上电视一展厨艺。其要求是：“注重营养科学，荤素搭配得当，制作简单省时，色香味俱佳”。按当时副食品价格水平，每套不超过 30 元，可供 6 人小家庭。将从观众来稿中选出 10 套菜谱进行录制，除夕播出。截稿期是 1988 年 1 月 31 日。

在稿件不断寄来时，

疫情突如其来。自 1 月 30 日至 2 月 14 日，每天新增病人超过 1 万例。到录节目的 2 月中旬，疫情更显严峻。当时策划该节目的初衷，不仅是为丰富荧屏，更想为 220 万户上海人家烧年夜饭提供参考；

一定要按计划完成。

拍摄借福州路菜场。台里规定演播室不能生明火，在菜场拍烧菜补货也方便；夏天已合作过“茄子菜小赛”。所幸的是，十名人选“最佳年夜饭”的观众没遭遇甲肝。

开拍那天，有的是夫妻结伴而来，有的母女搭档，手提肩挎的。钢种锅子、提篮式多层饭盒里装

在那个医学并不发达的年代，最初，人们只能将瘟疫的大肆蔓延归因于神灵的愤怒。据《卫藏通志》记载：百姓一旦染患天花，便被驱逐到山谷自生自灭，在驻藏大臣和琳看来实是有悖人伦，故于藏北浪荡沟修建房屋收治天花病人，供给口粮，让病人延缓时日，减少痛苦。

“劝人恤出痘碑”矗立在“唐蕃会盟碑”一侧，碑身阳面刻“永远遵行”四字篆书。该碑立于清朝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三月，由驻藏办事大臣和琳立。

文中的内容是，如果应对罹患天花之人，做法主要就是隔离“捐资修平房若干间”，“及时提供衣食，派拨汉番弁兵经理”，派专人打理保证信息透明，这样做的最后的效果还不错，“调养全活者十有其九，僧俗当已知痘症非不可治之患”。竖立在大昭寺门前的“劝人恤出痘碑”，既是唐蕃古道疾病传播的历史，也是汉藏共同面对疫情群策群力的见证。其中，清朝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委派地方大员建立隔离住所，防止天花蔓延，派专人进行管理，及时报告疫情，最后的效果能达到患者“调养全活者十有其九”的结果，已经不错，并且在认识上认为：“僧俗当已知痘症非不可治之患”，为巩固这一成果，要求群防群治，劝令遇有痘症，各捐给口粮，作为定例，从制度上将救治天花疾病的过程固定下来。

“劝人恤出痘碑”是中央政权对西藏地方政府防止天花蔓延的具体政策指导，并且由驻藏办事大臣和琳具体实施，政策得当，措施得力。树碑周知，也是想表现当时国家对边疆的重视，对疫情防控的重视和对生命健康的关怀。

劝人恤出痘碑

张安福

着成品，马甲袋里是生鲜食材、调料，还有自己得心应手的炊具等。因时间关系，每套只能现场做一个拿手菜或代表作。

先登场的是顾光耀、严正华观众的“龙腾火锅”，即火锅宴。构思是要解放年夜饭掌勺人，使一家人一起吃年夜饭。锅里黄鳍喻龙，祝新年龙腾虎跃。

讲经济实惠是上海门槛。一套 4 冷盘、6 热炒、1 汤 1 点心，王德民观众取名“经济宴”。其经济体现在套裁，其中有一母鸡四吃：冷盘卤鸡肫肝、如意菜（黄豆芽）拌鸡丝、热炒炸鸡排、以鸡头鸡脚熬鸡汤龙须面。一青鱼三吃是热炒茄汁鱼片、清蒸青鱼及咸菜头尾汤。一猪肉两吃是热炒珍珠肉丸、冬笋肉片。萧伯纳说，“经济是充分利用人生的艺术。”上海人在日常生活里，对这门人生艺术不仅充分利用，而且有艺术般的匠心独运。

有意思的是过中国年吃西式菜。有一套西餐年夜饭是三道菜：美式虾仁酿梨、蛋煎煎鱼白脱柠檬沙司、草菇烩鸡，一道汤是奶油鹌鹑汤，一道点心是水果面包布丁。另一套是中西合璧，罗福祥观众的冷盘酸黄瓜真有创意，不用醋，而用柠檬挤汁代替。不但酸，还带柠檬香；更灵的是不损黄瓜的颜色……

屋里热气腾腾，欢声笑语；忘却了外面肆虐的甲肝。可每当一只菜拍完，作者端碗捧盆：“勿要客气，尝尝味道。”没人举筷子，都是笑而婉拒。摄影在中午吃饭时，还掏出携带的不锈钢小盒，拿出酒精棉球让大家消毒碗碟呢。

经一天奋战，十套“最佳年夜饭”一一摆在几张大圆台面上。上海人的智慧和才情，在黑云压城时绽放出别样异彩。在一只只年夜菜里，倾注了一个



在上海打拼多年后，我终于结束了租房岁月，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陋室”。年前本计划着请好友来家里做客，然而，事与愿违，新冠疫情暴发，改变了一切计划。内心惶恐，只好宅在家里，连小区门口都不敢出。时间忽而变得格外漫长，往日热闹街道，亦冷清了自己除了看电视、阅读外，几无事情可做，百无聊赖。

一日我正在写文章，脑海中闪现出某段论述，需要参考书来印证。便匆匆地去书架里找书，然而明明记得是放在书架的第二层的，可排查了一圈之后，连参考书的影子都找不到，脑中句子终于遗憾地“随风飘散”——写作的时间都用在找书上。

出现此种状况，根源还是在自己身上。一是，平日自己酷爱买书。最近几年，电商更是屡屡进行图书大促活动，买书顺理成章地就成为我的固定消费。而在某些情绪低落的时候，逛逛线上书店，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也成为我最佳的减压方式。眼看着书越买越多，家里空间又着实有限，只好见缝插针地摆放。床头柜上还有空间，那么便尽可能地塞进去。卧室里还可以放个书架，自然会被“无情”地征用。窗台上可以摆些书……不知不觉间，一个小小的房子里，竟然放了三个书架。家里能用的空间，都被书给占据了。

二是，家里的书不像图书馆，会做严谨专业的分类，只是按照开本大小或体裁，做些简单的归类，如文学与社科，更为细致的分类，如诗歌、散文、评论等，则完全有心无力。现在的大多数时候，我们又都是即兴读书，浏览书架时，看见某本书，一时兴起，抽出来读上几段。久而久之，床头柜上、书桌上、飘窗上，皆是凌乱摆放的书。

因此，我便趁着额外的假期，开始整理凌乱的图书。

一开始，我觉得整理书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整理谁不会呢？不就是分门

此刻更应珍惜时间

王辉城

别类吗？可一旦做起来，困难远比我想象的要大，先用表格登记书名，再根据诗歌、散文、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子品类来归类。然而，做到一半时，我忽而发现，由于开本各异，分类是科学了，书参差不齐地摆放在一起，书架的空间利用率大为降低。

一部分早已摆放妥当的书，意外地剩出来，如何安置它们又成为一件难事，最后不得不让书一一归附原位。看来，整理也是一件难事，无怪乎现在在职业整理师，专门为客户整理衣橱、鞋柜等“琐碎”之事。

整理书架一事，尽管不算成功，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终于弄清自己究竟有多少本书。看到确切的数据后，虽一度觉得诧异，觉得自己统计有误，但细想一下，这些年来买书早已成为我最为固定的消费。日积月累下来，购书的速度远远快于阅读，所谓“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是也。

人是不能闲着的，一旦闲着了，便会琢磨出许多古怪的事情来打发时间。自我隔离的那些天，网上有不少数瓜子、数米粒、数草莓籽的图片在转。我的数书行为在一些人眼里或许和数瓜子差不多，但实际上，我节约了未来的时间。

朋友与我同住一小区，房子正好隔路相望，我家厨房窗外望过去，正好是他的厨房。一日，朋友家窗台上忽而多了盆水仙花，迎风而立。我站在窗前，怔怔望了好久。种花，或许是朋友认真对待时间的方式，真好！

哲学意义上的时间，是日复一日机械化的生活。有自省意识的人在意识到无聊的时候，很快就会进行寻求消灭无聊的对抗，努力压下去。当下，日常的重复显得尤为珍贵，这意味着我们有着安稳的工作、生活，无需顾虑三餐，有着固定的目标，因而特殊时期，我们更应该珍惜手中的时间，做些更有意义的事。

高原风起（中国画）黄沛沛



编者按：社区民警，上海过去叫户籍警，北方叫片警。户籍警的工作，有人形象地比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户籍警就是穿针引线的人，确保社区安全。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在吴泾派出所担任指导员。有一天，户籍民警小王来办公室找我，手里捧着一个水果篮和两条香烟，说是上交居民李阿姨送给他的礼物。我记得这已是小王第三次上交居民送礼了。

居民李阿姨是“小三线”退休人员，此番送礼为答谢小王为她办成了投亲户口。第二天，我上李阿姨家退回礼物，李阿姨颇感惊讶，她回原籍的户口能办成很不容易，为这事来回“跑”了 17 次，小王潜心办理，她是真心感谢民警小王的辛劳付出。李阿姨的话真是令我汗颜。本来，李阿姨退休后，按政策规定以投亲的理由回沪，只需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用一周的时间就可顺利落户，竟然拖了半年。李阿姨送礼在我却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

当时，办成一个户口，不少居民暗地里给民警送礼。送礼者觉得理所当然，收礼者也坦然自得，把一项应尽的职责视作对百姓的恩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警民之间往日的鱼水关系变了味，让人深为隐忧。

彼时，全市公安系统正在开展“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作风整顿教育，我将此事拿来全所讨论。有些民警沾沾自喜，以为李阿姨送礼事件正显示出“四难”整顿教育的成果，应上报表扬。我正色道：“为李阿姨送礼这件事来来回回‘跑’了 17 次，其中，5 次来派出所找不到民警本人，7 次回安徽的单位办理证明材料，还有 5 次找熟人打招呼，一件简单容易报户口的事，让老百姓来回

折腾，正说明我们心里根本没拿老百姓的愿望当回事，老百姓送礼是打我们的脸呐！”

我的一席话炸开了锅，大家受到了强烈的触动，议论纷纷。但是，认识的层面仍然停留在怎样解决好警民关系，做到笑脸相迎、言语亲和上。我和所长交换想法，老百姓是奔着办

耻辱止于公开

戴民

事来的，即便我们做到了门好进、脸好看、话好听，但事情办不成，老百姓仍然不会买我们的账，改善警民关系的思想问题好解决，办事制度的“藩篱”却难轻易剔除，户口事关老百姓的生计大事，而申报一个户口上下左右盘根错节，让老百姓如坠云雾，老百姓怎会没有怨言？这事表面上是“四难”问题，实质却是办事制度上存在弊端，必须除旧布新，让老百姓

真正能好办事、办成事。所长认可我的想法，问，制度上的改革，是你搞得定的吗？我将早先的想法和盘托出，所长听后莞尔，说不妨一试。

翌日，我集合所里的民警，到毗邻的照相馆，挨个照了大头像，每个人制作了身份证卡，标上职务姓名、接待时间、联系方式等，公开摆放在户籍窗口，并把日常办理户籍的程序和相关证明材料要求公开挂在墙上，让每一个来办事的群众都能方便找到民警，明了办理户籍的手续。

这事儿弄得动静挺大，彼时，这样的做法在全市 500 多家派出所是开先例。周边群众都颇觉新鲜，反响热烈，很多居民感戴，以前叫不上名字的民警陡然亲近起来，找民警也方便不少，依着公开的程序，办事再也不费周折。所里的民警对自己的约束也更加自觉。

分局户政科却传来不同的

声音，办事程序是内部掌握的机密，却叫一个基层派出所擅自公开，此事僭越犯规，甚至传言要我们做“检查”悔过。我一时感到压力。事情捅到了市公安局局长那里，时任局长张汉慈喜上眉梢，特意批示道，这是基层派出所为解决“四难”问题上的一个创举，值得肯定。

看罢批示，我内心如沐春风特别舒畅。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调深入，派出所公开办事制度已蔚然成风，当今互联网时代，依托“网上办事”，老百姓申请办事在手机上就能一键办成，每个派出所所在办理户籍项目上，明确要求让老百姓最多“只跑一次”，想当初，我由衷洞悉时代前进的脚步，深感老百姓满意的欢笑，才是我们期待的最好礼物。

十日谈

我当社区民警

责编：杨晓晖

明刊《逮捕令，于婚礼后执行》。